

【教育部名栏·孙子研究】孙子学史研究专题

“谋圣”不将兵:张良的兵学实践与角色定位新探

周尔祥¹, 陈林²

(1. 上海大学 历史学系, 上海 200444;

2. 温州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温州 325000)

摘要:张良作为战国秦汉之际最重要的谋士,之所以能够虚实结合、屡设奇计、决胜千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兵学知识的运用。综合不同兵书成书年代、张良家世以及史书记载可知,张良的兵学知识来源于《孙子兵法》、《三略》、《六韬》等典籍之精髓,其中“制胜于无形”、“任贤擒敌”、“兵胜之术”等谋略在辅佐刘邦入关、灭楚乃至定国安邦的过程中得到了实践运用。张良“不特将兵”,非仅因“多病”之故,实系刘邦集团战略需求与其个人特质共同作用的结果。张良“谋圣”之誉不仅源于其超群的军事智慧,更在于其扮演的整合兵学智谋、政治道义与王朝伦理的“王者师”角色,其“不将兵”恰恰是其战略价值与政治智慧的体现。

关键词:张良;兵学;谋圣;不将兵;角色

中图分类号: E 892; K 23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86/j.issn.2097-4973.2026.03.002

张良作为“汉初三杰”之一,以其高超的军事智慧辅佐刘邦攻城略地,为西汉政权的建立与稳定立下卓越功勋,被誉为“谋圣”。宋人黄震在其《黄氏日抄》中总结张良事功时说:“利啖秦将,旋破巉关,汉以是先入关。……此汉所以卒取天下。劝封雍齿,销变未形。劝都关中,垂安后世。劝迎四皓,卒定太子。又所以维持汉室于天下既得之后。凡良一谋一划,无不系汉得失安危,良又三杰之冠也哉!”^{[1]154}后世对张良的书写,多如黄震一般,浓墨重彩于张良的军事智慧。目前学

界关于张良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生卒年、形象流变、退隐原因及通过张良透视相关宗教思想、帝师文化等方面^①,专门探讨张良兵学知识及其化用的研究尚显不足。此外,围绕张良的人生经历与际遇,人们常感困惑:张良既然深谙兵学之道,必然也会“将兵”。然而,史书中张良“未尝有战斗功”、“未尝特将”之记载以及刘邦所言“运筹帷幄之中”等话语似乎给人以张良是只会“运筹帷幄”而不会将兵的谋士形象。那么,张良究竟会不会将兵?若不会,因何具备更高超的“运筹帷

① 代表性成果有罗剑波:《张良卒年考补》,《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李悠罗:《张良侠士形象的文化内涵》,《学术交流》,2013年第8期;龚阔英:《论张良思想的转变——从复立韩国到维护汉朝一统》,《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龚留柱,张靖人:《中国古代的“帝师”文化——以张良为中心的考察》,《军事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冯渝杰:《“汉家”的光影——中古刘、李、张氏神化的历史与宗教背景》,《复旦学报》,2020年第2期;郭硕:《“帝师”与“佐命”:张良形象与南北朝初期的政治实践》,《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7期;张文江:《论张良的知识结构,兼述〈太公兵法〉要义》,《上海文化》,2022年第9期;陈霞:《从张良入世建功到出世修道看道家智慧》,《中国宗教》,2025年第5期;等。

收稿日期:2026-03-28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2JZD034)

第一作者简介:周尔祥(1994—),男,山东滨州人,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先秦秦汉史研究。

E-mail: qfsfzex@163.com

幄”本领?若会,又因何“不特将”^①?张良被誉为“谋圣”的核心价值体现在何处?这应是在张良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张良的兵学知识来源

张良具备“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军事才能,显然具备渊博的兵学知识。探讨张良的兵学知识来源,首先须正视一个学术前提:先秦两汉兵书,特别是《六韬》、《三略》等托名姜太公或黄石公的典籍,其成书年代、作者归属及文本源流,在学界长期存在争议。尽管多数学者认为今本《六韬》、《三略》杂有后世附益成分,但其成书时段当在战国中后期至秦汉之际已是共识^②。关于圯上老人所授张良之书,有学者认为其即初名为《太公兵法》的《黄石公三略》^{[2]466},但亦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其所传或为当时流传的某类《太公》兵法抄本,不能等同于今本《三略》^③。综合来看,笔者认为张良所得与今本《三略》存在密切文本渊源^④。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旨在说明张良兵学思想与传世兵书的内在关联,而非断言其具体文本来源的唯一性与确定性。张良出生于战国末期,综合不同兵书的成书年代、张良家世以及史书记载,可推断张良的兵学知识,至少受到如下兵书及其思想的影响。

其一,《孙子兵法》是中国兵学的一部集大成之作,一般认为其主体部分在战国后期就已成书^⑤,而张良既出生于相国之家,在诸侯争雄的

战国时代,想必应接触、学习过该书。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对张良的灵活用兵给予过精辟论述:“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3]3312}其中“制胜于无形”和“无知名,无勇功”分别本源于《孙子兵法》中的《虚实篇》和《形篇》。《孙子兵法·虚实篇》载:“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错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4]139-141}

《史记》所言“无知名,无勇功”,本源于《孙子兵法·形篇》中的“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4]83}。司马迁短短几句话,其中有两句本源于《孙子兵法》,恐非巧合,这传递出张良的兵学知识必有一部分出自《孙子兵法》。

其二,圯上老人所授之书。《史记·留侯世家》明载,张良得黄石公所传《太公兵法》。黄石公“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3]2035}张良还因此“常习诵读之”^{[3]2035}。据何清谷等学者研究,《黄石公三略》在汉代曾以《太公兵法》之名流传,至东汉后方渐定名为《黄石公记》或《三略》^{[2]461-464}。尽管学界对具体文本的流传细节尚有分歧,但张良的兵学思想受这部以道家为本、兼采儒墨的太公系兵书影响,应无疑义,李康《运命论》亦言“张良受黄石公之符,诵

① 所谓“不特将”,除与临时受命率领偏师执行战术任务之外,张良或许有着以军事主将身份独立指挥大规模战役的能力。前者属于战役战术层面的“临时领兵”,后者则关乎战略层面的“专任大将、独当一面”。下文还会论及。

② 关于《六韬》《三略》成书年代及真伪问题的代表性讨论,可参见张烈:《〈六韬〉的成书及其内容》,《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邵鸿:《〈六韬〉二题》,《求是学刊》,1988年第3期;何清谷:《〈黄石公三略〉考辨》,载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论丛》编委会编《秦文化论丛》第七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458-470页;全晰纲:《〈六韬〉的成书及其思想蕴涵》,《学术月刊》,2000年第7期;祁志祥:《〈六韬〉的政治军事思想:文韬武略、全胜不战》,《学术界》,2022年第2期;王震:《〈六韬〉成书及其版本汇考》,《文史哲》,2022年第2期;张申:《〈六韬〉文本考论》,《山东航空学院学报》,2025年第5期,等。

③ 历代学者并非根据书名是《黄石公三略》,认定其作者就必定是黄石公,而是认为《太公兵法》是经由黄石公推演而后产生了《三略》,再把它授之子房。《三略》虽确非黄石公亲手所写,而是一部后人托名黄石公的著作,但如果仅仅因为《三略》是由后人托名而作,就全盘否定其价值,是十分没有说服力的。参见钱明辉:《〈黄石公三略〉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24年,第15-16页。

④ 本文在传统意义上将张良所得《太公兵法》与后世所称《三略》视为具有渊源关系的同源文本,故在论述中不再做严格区分,而是统合使用《三略》的表述方式。

⑤ 关于《孙子兵法》成书的讨论,可参见金精:《〈孙子兵法〉十三篇的成书年代是公元前514年》,《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吴春生、武振玉:《〈孙子兵法〉成书年代补说》,《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关万维:《〈孙子兵法〉成书时间新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等。

《三略》之说”^{[5]2296}。

其三,《六韬》是成型于战国后期的兵家著作,西汉时逐渐编订并汇入《太公》的整体中,通常列入兵家类或亦列入道家类。《李卫公问对》卷上说:“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可见,《六韬》也是张良兵学知识的重要来源。

需要指出的是,张良兵学知识的来源不可能仅仅局限于以上三部兵书。先秦时期的诸多兵书如《军政》、《军志》、《军谡》及古《司马法》等虽多已亡佚,但依据张良家世推测,其在当时极有可能学习过。但正如谢乃和先生所言,这些兵书的内容已经不是战争事件或战争行为的简单罗列,更多的是从战争中抽象出来的经验和渐趋成熟的军事观念^{[6]36}。张良对上述军事著作及其蕴含的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和思想的汲取,奠定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为日后建功立业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二、张良对兵学知识的实践化用

张良作为刘邦最重要的谋臣,之所以能够虚实结合、屡出奇计、决胜千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兵学知识的融通运用与实践,特别是战略战术、用兵选将等军事问题上的决断,往往成为制胜的关键。

(一)运用“无形”之谋以安邦国

《孙子兵法·虚实篇》载:“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兵本有形,何以制胜于无形?这里边蕴含着虚与实、动与静等辩证法则,如梅尧臣所言“兵本有形;虚实不露,是以无形”^{[4]140},亦即“我形人而不使敌形我,使敌有形而我无形”。《虚实篇》在于阐扬虚和实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汉六年(前201),刘邦大封功臣,然所封“皆故人所亲爱”,所诛“皆生平所仇怨”。所封者仅二十余人,大批将领“畏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经常凑在一块窃窃私语“相聚谋反”。如此情景,刘邦甚是担忧。“上乃忧曰:‘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故,数尝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矣。’”^{[3]2043}

刘邦遵从张良之计封雍齿为什邡侯,成功避

免诸将谋反。尽管封雍齿对于刘邦而言并非真心实意(即“虚”),但在诸将看来却是“人人自坚”之“实”,故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司马光进一步讲:“高帝初得天下,数用爱憎行诛赏,或时害至公,群臣往往有觐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纳忠以变移帝意,使上无阿私之失,下无猜惧之谋。”^{[7]372}在他看来,张良正是以“劝封雍齿”为契机,规谏刘邦不以“爱憎行诛赏”而打消臣子的猜疑和恐惧,进而使“国家无虞,利及后世”。司马光更深刻地看到“劝封雍齿”这一“虚”的背后,蕴含着张良规劝刘邦赏罚不能仅仅凭借个人好恶,而是要尽可能地公平运用皇权,这恰恰关系着汉朝的长治久安这一“实”。

《孙子兵法·形篇》曰:“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曹操对于该句的解释为:“敌兵形未成胜之,无赫赫战功也。”李筌认为:“胜敌而天下不知,何智名之有?”杜牧、梅尧臣等人也持有相同看法,但张良是少数例外者,如“患销未形,人谁称智?不战而服,人谁言勇?汉之子房、唐之裴度能之”。张预也认为:“取胜于无形,天下不闻料敌制胜之智,不见搴旗斩将之功,若留侯未尝有战斗功是也。”^{[7]83}这说明,张良已将“无智名,无勇功”化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苏轼在《留侯论》中指出:“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8]352}这可视为苏轼对张良“无知名,无勇功”的中肯评价。

(二)推动“任贤”之法以御将师

《三略·中略》云:“《上略》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中略》差德行,审权变;《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故人主深晓《上略》,则能任贤擒敌;深晓《中略》,则能御将统众;深晓《下略》,则能明盛衰之源,审治国之纪。人臣深晓《中略》,则能全功保身。”“《上略》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人主照《上略》做就能“任贤擒敌”,即任用贤能之人为将,战胜敌方。刘邦在作战中“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这与“设礼赏”比较吻合。但在“任贤擒敌”方面,刘邦似不尽擅长,故常问询张良。如刘邦兵败彭城后,欲将函谷关以东地区赏赐给骁勇善战之人以合攻

项羽,“下马踞鞍而问谁可与共功”^{[3]2039}。张良进谏说:“九江王黥布,楚泉将,与项王有郗;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3]2039}张良深谙“任贤擒敌”之理,劝刘邦分封黥布、彭越与韩信,最终己方由弱转强、战胜敌方。

《上略》开篇讲“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特别强调英雄归心与赏禄有功的重要性。楚汉划鸿沟而治后,刘邦抓住战机追击项羽,但因“诸侯不从”而兵败。刘邦问计张良,良对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天下,可立致也。……今能取睢阳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从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复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许两人,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9]49}核心意思就是规劝刘邦“获固守之,获厄塞之,获难屯之,获城割之,获地裂之,获财散之”(《三略·上略》),厚赏封地给韩信、彭越,“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以“著成败”。于是刘邦“发使使韩信、彭越。至,皆引兵来”^{[9]49},从而赢得楚汉战争。

《中略》差德行,审权变,是“御将统众之学”。人主按《中略》做就能“御将统众”。君主能否“御将统众”关系大局稳定,这就需要君臣互相信赖,君主驾驭将帅进而与将帅团结一致统帅士兵。韩信破齐之后“自立为齐王,使使言之汉王”^{[3]2056}。刘邦非常愤怒,史载:“汉王大怒而骂”^{[3]2056}、“汉王怒,欲攻之”^{[9]46}。韩信对于楚汉之争的作用至关重要,正如蒯通语韩信:“当今两主之命县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3]2623}。张良更是深知此理,所以他建议刘邦“不如因而立之,使自为守”,不然,则“变生”。刘邦“审权变”,及时而悔悟,“善遇”韩信,复骂“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3]2621},遣张良操印绶立韩信为齐王,密切了与韩信的信任,“征其兵击楚”,成功做到“御将统众”。张良与陈平一道促成了战时刘邦与韩信这对“君将”的互信局面。

(三)洞察“兵胜”之机以克强敌

《六韬》堪称“军事百科全书”,其军事韬略以《兵道》篇最为集中。

“武王问:‘两军相遇,彼不可来,此不可往,

各设固备,未敢先发。我欲袭之,不得其利,为之奈何?’太公曰:‘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一合一离,一聚一散。阴其谋,密其机,高其垒,伏其锐士。寂若无声,敌不知我所备。欲其西,袭其东。’武王曰:‘敌知我情,通我谋,为之奈何?’太公曰:‘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10]71}

项羽分封后,“汉王之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此时刘邦若要“先发袭之”必然“不得其利”,张良趁机建议刘邦“烧绝所过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张良劝说刘邦烧毁栈道有两重意思,一是“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即“汉王烧绝栈道,无还心矣”。在使项羽相信刘邦“无心东还”的同时,张良还“密察敌人之机”,成功将项羽的注意力和兵力集中到齐地,使刘邦得以趁此机会“还定三秦”。

“良乃遗项羽书曰:‘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复东。’又以齐反书遗羽,曰:‘齐与赵欲并灭楚。’项羽以故北击齐。乃以齐王田荣反,书告项王。项王以此无西忧汉心,而发兵北击齐。”^{[9]2028}张良劝刘邦烧毁栈道实为一石二鸟之计,同时“密察敌人之机”,使项羽忙于与齐作战、被齐牵制,解除刘邦还定三秦的后顾之忧,这正是“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一合一离,一聚一散”的化用。当划鸿沟为界后,张良建议刘邦抓住战机,“欲其西,袭其东”,追击项羽,“复疾击其不意”,使得项羽陷于被动,并成功使彭越、韩信出兵,合围项羽。以上皆可视为张良对《六韬》中“兵胜之术”的成功运用。

综之,张良在军事上灵活化用兵家谋略,屡设奇策,助刘邦攻城略地,决胜千里。诚然,通过《史记》等史籍与《孙子兵法》、《三略》、《六韬》等兵书与之进行比对分析,未必全然符合张良军事思想之本意,但却可说明张良不但接受过系统的兵学知识,还善于融通并灵活运用各家兵法于实际作战中,在兵学方面有着高深造诣。

三、张良“不将兵”原因及其角色定位

张良深谙兵家之道,必然也会“将兵”,但史书中他似乎只是一个谋士形象。事实上,“谋圣”不将兵是汉初统治者立足统治需要而为张良刻意塑造的历史形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多个

方面。

(一)健康局限与战略分工：“多病”与“运筹”之需的双重考量

《史记》中多次提及的“多病”和“有疾”是张良不将兵原因之一。《史记》载“张良多病，未尝特将也”，但“不特将”并不意味着不能、不会将兵。张良曾“为韩申徒，与韩王将千余人西略韩地，得数城”，张良与韩王“将”千余人而得到“数城”，可证明张良是位将才。后“沛公拜良为厖将”^{[3]2036}“沛公之从洛阳南出轘辕，良引兵从沛公，下韩十余城，击杨熊军”^{[9]2026}。以此来看，张良亦能将兵。因此，笔者认为张良会“将兵”且有着“不特将”的原因。

所谓“不特将”，是指除此种临时受命率领偏师执行战术任务（如“略韩地”、“击杨熊”）之外，张良或许有着在战略层面“专任大将、独当一面”的能力。那么，张良为何终其一生未曾像刘邦、韩信那样以军事主将身份亲临前线、统领士卒、独立指挥规模性战役呢？张良有病固然是“不将”的重要原因，但从史书多次提及张良多病、持续时间之久来看，其病应是慢性病，而刘邦中箭之后以及晚年病重之时，仍然御驾亲征，可见，“病”非古代政治家、军事家“不将兵”的主要原因。除张良自身体质的“因病不特将”外，更可能是刘邦有意不让张良将兵。之所以如此，在于刘邦故留张良在“帷幄”及时“运筹”提供卓见，特别是于“封六国”一事，若没有张良及时赶回而听酈食其之见，刘邦大势已去必然。《史记》也正是在记载此事前一段，才开始出现张良多病的描述：“张良多病，未尝特将也，常为画策臣，时时从汉王。汉三年，项羽急围汉王荥阳，汉王恐忧，与酈食其谋挠楚权。……食其未行，张良从外来谒。……良曰：‘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事去矣。’……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令趣销印。”^{[3]2040-2041}

由此来看，张良多病的记载与此事几乎同时出现，恐非偶然。因此，张良“不特将”实系刘邦集团战略需求与其个人特质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廉节形象与集团凝聚：“王者师”的身份塑造与政治功能

张良早年曾“习礼淮阳”^{[3]2034}，廉节知耻，且对刘邦忠贞不二以致“亡去不义”，“沛公殆天授”

“遂从不去”，是谋士、知礼、忠诚的符号和象征。实际上，张良自随刘邦伊始就扮演着忠臣与谋臣的双重角色。入秦宫时刘邦浮现不思进取念头，“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3]2037}。樊哙劝谏无效之下，张良以“忠言逆耳”对刘邦晓以利害，建议刘邦把生活俭朴当作根基，安于享乐就等同于“助桀为虐”，刘邦这才还军霸上。刘邦平定天下之后“欲长都洛阳”，这源于刘邦功臣集团山东人居多，可能是因为他们既思乡心切，亦欲享受衣锦还乡的荣耀，但也反映出了刘邦集团大都缺乏战略眼光。张良不顾个人安危，冒着得罪刘邦功臣集团的风险，站在军事、战略乃至经济发展的角度以大局为重，支持小人物娄敬的建议，劝谏刘邦迁都，这既是对刘邦尽忠，更是为汉家天下尽忠。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刘邦有意将张良作为一面旗帜，以对内维持集团人员效忠自己，对外招揽“廉节之士”。反观汇聚到刘邦身边的大都是缺乏知识与礼节的非“廉节之士”乃至无赖无耻之徒，陈平就曾对刘邦直言，“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并指出刘邦“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节之士”^{[3]2055}。相比之下，项羽“恭敬爱人”，使得“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因此他建议刘邦“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3]2055}。两长即为项羽的“恭敬爱人”和“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

刘邦本人傲慢而少礼，其集团“士廉节者不来”、“嗜利无耻者多归汉”。若不讲礼义廉耻走向见利忘义，又何谈忠诚？这一点，刘邦不可能意识不到。因此刘邦既需要“廉节之士”前来投奔，也需要“嗜利无耻者”变为“亡去不义”、“沛公殆天授”的坚定追随者。虽然刘邦对酈食其、陆贾等儒生起初并不尊重，但稍加劝导就能够从善如流，也反映了刘邦虽不情愿但却不得不需要廉节之士的归附，而张良正是充当了“廉节之士”与“亡去不义”的双重形象。因此刘邦留张良在“帷幄之中”正可起到忠诚与廉节的双重效果，既能增强集团归附和效忠意识，也能吸引“士廉者来”，改善集团少礼的形象，故而刘邦有意留张良于“帷幄”之中“画策”，随身左右。公元前205年叔孙通就率领儒生弟子百余人追随刘邦，后为朝廷制定礼仪。

因此,就刘邦集团而言,张良扮演了整合兵学智谋的军事战略角色、政治道义与王朝的忠义伦理角色。所以,从张良个人身体状况、刘邦对张良“运筹”之卓见的谋略需要以及张良具有的“廉节”与“忠诚”双重形象分析,或可进一步体会张良“不特将”的原因。

(三)阳谋品格与价值底蕴:“谋圣”之誉的深层依据

张良之所以被称为“谋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所行军事计谋是阳谋而非阴谋,这源于张良兼采儒墨家之善融入其兵学体系之中。《三略》、《六韬》等兵书是假托太公之名所作的道家兵学著作,但也采儒墨之善。《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3]1478-1479}司马贞《索引述赞》指出:“太公佐周,实秉阴谋。”^{[3]1513}《汉书·艺文志》载道家类曾著录,“《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9]2026}。清沈钦韩《汉书疏证》云:“《谋》者即太公《阴谋》也。”^{[11]686}可见,“阴谋”与“阴权”是太公兵权与奇计的特色,全晰纲将《六韬》中《文伐》提出的十二条方略归为“假以尊崇”、“贿赂”、“迷惑”、“离间”四类^[12],可视为“阴谋”之计。而儒家讲求光明正大、光明磊落,做事符合道德规范。《三略·中略》云:“臣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以事君。”《六韬》亦云:“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德之所在,天下归之”^{[10]5}。这皆是对儒家之德善思想的借用。

张良以《太公兵法》等兵书知识辅佐刘邦成就帝业的过程中,注重择取兵法中“阳谋”而规避阴谋诡计,不使用“假以尊崇”“贿赂”“迷惑”“离间”等手段,行的是光明正大的兵权与奇计。反观,陈平之所以为后世所诟病,就是他阴谋居多,较少注重德行^①。陈平曾自称:“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3]2062}阴谋不仅是道家所禁,贵智尚诈

更是儒家所极力反对的。传统儒、墨等诸子思想与《三略》、《六韬》等兵书中蕴含的“儒墨之善”,对张良的价值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学者已指出,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经历了一个由“以礼为本”到“以奇用兵”的衍变,这一嬗变过程主要在先秦时期完成。古代兵书中既有反映早期军事谋略意识的言论,又有重视武德的兵学思想、进退有度的军礼观念以及对战争正义性的思考,体现了道德性与实践性的并重^{[6]36}。在“儒墨之善”的影响以及“学礼淮阳”的基础上,张良所行之阳谋,正表明了其对武德的重视、对战争正义性的思考,这不仅体现了其个人高超的军事智慧,还彰显了其高尚的道德节操,其最终的目标是追求政权的稳定与和谐秩序的构建。

张良的“谋圣”形象,根植于其深厚的兵学素养与高超的实践智慧。他的兵学知识博采《孙子兵法》、《三略》、《六韬》等典籍精髓。在辅佐刘邦进关、灭楚以及稳定汉初政权的过程中,张良将兵学知识在融通致用的基础上转化为军事战略,如他强调“制胜于无形”,注重“任贤擒敌”与“御将统众”,善用“兵胜之术”,成功做到了攻城略地、决胜千里,为西汉政权的建立与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

张良“不特将兵”,并非缺乏统兵之才,而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历史选择。其个人“多病”仅是表层原因,深层次原因在于刘邦集团的整体战略需求与张良独特的个人价值。刘邦需要张良这样一位兼具高超战略眼光、绝对忠诚品格与廉正道德气度的“王者师”常随左右,以便既能够帷幄之中运筹全局,又能以其“廉节之士”的形象凝聚人心、规范集团行为。因此,张良的“不特将”,恰恰使其超脱了具体战场的胜负,上升到整合军事智谋、政治道义与王朝伦理的战略家高度。诚如龚留柱先生所言,张良对汉帝国所作的贡献主要是方向性的战略规划,奠定了汉400年一统江山的稳固之基^[13]。这既是其“谋圣”地位的核心内涵,也是其历史价值的独特体现。

① 魏无知向刘邦推荐陈平,在听闻陈平“盗嫂受金”之后,刘邦责问魏无知。无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害处于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且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

参考文献:

- [1]黄震.黄震全集:第5册[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 [2]何清谷.《黄石公三略》考辨[M]//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论丛》编委会.秦文化论丛:第7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458-470.
-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4]孙武.孙子兵法集注[M].曹操,等,注.黄朴民,赵海军,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96.
- [5]萧统.文选[M].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6]谢乃和.先秦《军志》佚文及其军事思想[J].军事历史研究,2019,33(4):36-48.
- [7]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8]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文集一[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 [9]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0]六韬[M].陈曦,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
- [11]沈钦韩,等.汉书疏证(外二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12]全晰纲.《六韬》的成书及其思想蕴涵[J].学术月刊,2000(7):94-98.
- [13]龚留柱,张靖人.中国古代的“帝师”文化:以张良为中心的考察[J].军事历史研究,2017,31(2):42-54.

“The sage of stratagems who never commands troops”: a new exploration into Zhang Liang’s military practice and role orientation

ZHOU Erxiang¹, CHEN Lin²

(1. Department of History,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We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enzhou 325000, China)

Abstract: Zhang Liang, the most pivotal strategist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was able to seamlessly integrate the virtual and the real, repeatedly devise ingenious stratagems and secure decisive victories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and his achievements was largely attributable to his adept application of military scholarly knowledge. A synthesis of the compilation dates of various military classics, Zhang Liang’s family background and historical records reveals that Zhang Liang’s military knowledge was derived from the quintessence of ancient texts including *The Art of War*, *The Three Strategies* and *The Six Secret Teachings*. Strategies such as “securing victory in imperceptible forms”, “appointing worthy talents to subdue enemies” and “the art of attaining military victory” were put into practical application during his assistance to Liu Bang in entering the Guanzhong region, eliminating the Chu regime and ultimately stabilizing the state and securing the dynasty. The fact that Zhang Liang “never specifically commanded troops in person” was not merely due to his “chronic poor health”, but rather the combined outcome of the strategic demands of Liu Bang’s faction and his own personal traits. Zhang Liang’s reputation as the “sage of stratagems” stemmed not only from his extraordinary military wisdom, but also from his role as a “King’s mentor” who integrated military stratagems, political morality and dynastic ethics. His choice of “not commanding troops in person” is precisely a manifestation of his core strategic value and profound political wisdom.

Keywords: Zhang Liang; military science; sage of stratagem; not command troops; role

(责任编辑:许 金)

引用格式 周尔祥,陈林.“谋圣”不将兵:张良的兵学实践与角色定位新探[J].山东航空学院学报,2026,43(3):8-14.

Zhou Erxiang, Chen Lin. “The sage of stratagems who never commands troops”: a new exploration into Zhang Liang’s military practice and role orientation[J].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2026, 43(3): 8-14.